

于
刚 著

燕
山
蜀
水
錄



三
廬
山
蜀
水

錄



燕山蜀水录

于刚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燕山蜀水录

于刚著

责任编辑：肖屏东 甘露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088邵阳印刷厂印刷

※

198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625 插页：2

字数：256000 印数：1—1000

ISBN7—217—00554—X

K·57 定价：4.70元

序

老友于刚把他早年的一些文章汇集成书，要出版了，我很高兴。他的旧体诗写得那么好而且多，我直到他打算出《霜叶集》的时候才知道，而这些文章，有几篇我是当时就读过的。

说是老友，有对的一面。我们于一九三八年在长沙抗日救亡运动中相识，后来在重庆《新华日报》共事。特别是史无前例的岁月之后，我调回北京，重逢恍如隔世，往来日益密切，常常在一起吃狗肉。相交可谓久矣，深矣，能说不是老朋友吗？

但是也不完全对。在我，他是老大哥。最初相见的时候，我高中毕业不久，刚入党，是个地地道道的小青年。而于刚，虽然仅仅比我大四岁，却经历过“一二·九”的洗礼，是那次抗日学生运动中的健将，入党比我早，又是大学毕业生，知识、经验、能力，我都不可同日而语。当时相识的人里面，象他那样的，还有好几位。象我这样的，另有一大批。我们这批小伙子中间，就有人称他们为“老干家”。这个词现在没人用了，我也说不清为什么不称“老大哥”。总之，是打心眼

几里敬佩的。

于刚是个大嗓门，这和他的豪爽性格相符合。在重庆的时候，大概是一九四〇年吧，有一次谈天，他说：“你象个大学二年级学生。”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他又说：“反正不象个一年级新生，也不象个三年级老生。”后来我常常想，我为人处事，确实常常是幼稚的成份多，老练的成份少。拿当时来说，作为我们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唯一公开的机关报的记者，我应当老练些。拿现在来说，年近古稀，似乎更应该老成持重，练达圆通才是。然而不然，几十年过去了，依旧是个“二年级学生”。如今倚老卖老，有时候反而沾沾自喜，其实不过是藉此掩短，聊以自慰罢了。想起当日谈天，不禁哑然失笑，于刚的确有眼力。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国民党在袭击新四军军部之后，又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全面内战已经箭在弦上了。为了避免损失，《新华日报》奉命大规模疏散人员，要各人靠自己的社会关系去隐蔽起来。我临走的时候，于刚以支部书记的身份跟我谈话。我担心的是，此去独自活动，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之下，时间多长说不定，万一接不上组织关系，将来党怎样了解我这段经历呢？光凭我自己，我怎么说得清呢？于刚说：“党对一个同志，基本的了解和信任总是有的，这一点你尽管放心。”这句话和他那诚恳的态度，使我感到很温暖，印象十分深刻。尽管后来在一套“左”的做法之下，特别是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许多人反其道而行之，但是坚持这种精神的，还是大有人在。所以，对于于刚其人其言，我

是至今赞赏的。

这本书所收集的，就是我所知的这样一个人写的文章。

“一二·九”运动时，他在北平报纸上发表文章对右翼作战。对立面是些有名人物，如教授先生陶希圣——就是后来为蒋介石操刀写《中国之命运》的那一位；还有当时坚决反对“新启蒙运动”的杨立奎。从那时开始，他用“于刚”作笔名，渐渐地以假作真，他的本名“陈泽云”反而不为人所知了。他是个职业革命家，党的组织工作者。全国解放以前，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他是在从事某一项工作的时候，有话要说，便发而为文，而不是个主要以笔杆作枪杆的人。打开这本书的目录，内容琳琅满目，几乎无所不谈。然而万变不离其宗，谈的都是有关思想的问题。读者可以从中知道，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思想界某些情形，以及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们，脑子里碰到的和思考的是些什么。当然，从中还能得到些启发。我想提醒一句的是，那时候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不用说最初在北平，即便是后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面，也不是能畅所欲言的。有时候不得不曲里拐弯，有时候不得不涂些保护色；然后，接触到正题了，又往往只能象武林中常说的那样，“点到为止”，——只可意会，不能言传。这种现象，也是历史吧。

这样一位老大哥要我给他的文集作序，我是引以为荣的，便写了这些话。

李 普

一九八六年三月三十日于北京

自序

收进这本小册子的有两部分文稿。一部分是三十年代“一二·九”运动之后到“七·七”抗日战争爆发时写的，另一部分是四十年代前期，我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期间写的。

写作第一部分文稿的时候，我正在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念书。这时期文稿的大部分，发表在当时《北平晨报》的青年问题副刊上。这时候，同我一起在“一二·九”当天进入新华门请愿的董毓华同志，正在《北平晨报》王颀竹同志家中养病。王颀竹是我党地下党员，当时在《北平晨报》担任副刊编辑。董、王二位约我经常为晨报青年问题副刊撰稿，这就使我有较多的机会就当时在运动中遇到的问题发表一些随笔。我在重庆时期写的文稿，发表在当时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上，大都是工作之余因时因事写下的一些随感杂录。因为这两部分文章都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报刊上发表的，所以有些地方的行文立意，不免有点曲折和隐讳，有的地方还留下了被删略的痕迹。现在在这两部分文稿后边，附录了几篇回忆的文章，目的是为这两部分文稿提供一些有关写作背景的材料。

一九八五年前，师范大学的校友们为了纪念“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特地编辑了一本《一二·九运动与北平师大》的专集。我的第一部分文稿，很多篇被他们热情地搜集了进去。全部文稿包括重庆时期文稿的搜集工作，则有赖于已故老友于益之同志的女儿沪生，是她满怀热情地组织力量抄录整理，才使这些四五十年来散在报刊上的文稿，得以重新汇集起来。

同志们督促我把这些文稿编印出来，供关心青年运动史和思想战线斗争史的朋友作一个侧面的参考材料。老实说，我真有点诚惶诚恐。但眼看着已经搜集起来的東西再让它散失湮没，又有些舍不得。承湖南人民出版社几位同志的勉励支持，使这个小册子终能出版，又承李普同志作序，李锐同志题写书名，谨在此一并致谢！

一九八六年三月

(85)	再会青年们的早晨	
(84)	“五四”以来的青年	
(17)	青年们的回忆	
(85)	目 录	
(88)	青年们的早晨	
(86)	青年们的早晨	
序	李 普	(1)
自序	李 普	(1)
(001)	青年们的早晨	
学籍和资格		(1)
青年思想之烦闷		(7)
怎样克服自傲的心理		(11)
恋爱与结婚		(16)
学生运动中的青年病		(21)
献给青年们的导师		(26)
伟大的启示		
(21)	“五四”的回顾和学生运动的前瞻	(31)
与王芸生先生谈青年政治思想		(38)
与陶希圣先生谈“西班牙主义”		(46)
新启蒙运动与青年		(53)

再给青年们的导师	(59)
怎样认识“新启蒙运动”	(64)
写给暑假回家的同学	(71)
北方青年的新觉悟	(78)
湘第一纱厂工潮	(83)
由“小先生”被捕谈到青年思想问题	(86)
民族气节与赴死决心	(93)
目前大学教育的严重现象	(95)
展开文化上的拓荒运动	(100)
武汉新姿	(104)
怎样才能统一全国青年组织	(107)
——对于武汉当局解散青年团体的意见	(107)
突飞猛进中的苏联新加盟国	(111)
目前抗战局势中我们的首要任务	(129)
略谈自我批评	(137)
战斗中的陕甘宁边区工人	(140)
引证，还是篡改	(145)
是谁“落后”和“倒退”	(150)
我们应当反求诸己	(155)
十二年前的一颗殒星——纪念恽代英同志	(161)

略论对被俘敌伪官兵的宽大政策	(164)
献给大后方的同学们	
——纪念“一二·九”六周年	(168)
锻炼体魄，担当反法西斯巨任	(173)
扩大中国青年团结的基础	(179)
记取十年前宝贵的教训	(184)
青年怎样认识事务工作	(190)
医治“急性病”	(198)
痛快指摘与耐心培养	(201)
读列宁论“自由恋爱”的两封信	(205)
略谈“老实”	(209)
对待批评的两种态度	(213)
批评者的自省	(215)
“局外人”和“局内人”	(218)
大有出息的负担	(221)
职业青年之友	
——评《职业青年之学习与修养》	(224)
年年今日——“一二·九”七周年纪念	(230)
错误即考验	(232)
不能放过的消息	(235)

创造力·责任心	(237)
论事务工作者的业务学习	(241)
说“变”	(252)
探照灯不可不亮	(256)
学习林祥谦同志的精神	(261)
学习季米特洛夫的好榜样	(264)
——在德国蒙难十一周年纪念	(264)
痛悼江云伯同志	(267)
略谈分析时局的思想方法	(269)
刘光死了？我不相信！	(273)
收起你那无声枪吧！	(276)
走人民自己的道路	(279)
——读《解放日报》两社论笔记	(279)
从群众中求进步	(284)
倾听所谓“小人物”的意见	(288)
以行动答复美军暴行	(291)
偶忆“南下宣传”	(295)
——纪念平津“北·二·一”——	(295)

附录

回忆“一二·九”时期的北师大	(299)
----------------------	-------

抗战初期我在湖南从事青年工作的经历

.....(330)

七年两度忆“新华”.....(348)

重庆《新华日报》胜利撤退延安始末

.....(366)

我尊敬的一位老师——忆陈奎生先生.....(385)

学籍和资格

前些日子接到一位朋友从故乡寄来的信。这位朋友在三年前和我同时考入北平某大学，不料他肄业未满一年，就因肺病休学。按照某大学的学则，学生休学继续达两年以上就令其退学。我这位朋友的休学期限到本期开学，已满两年，但到医院检验结果，因为肺病未愈，不能复学。他是一位特别重视学业的人。他甚至想力疾复学勉强保留学籍。但终于因着身体的缺憾使他抛弃了学籍。这件事在他实在是一个莫大的打击，因此他写了一封极沉痛的信给我。这封信，引起我许多的感慨！

青年人谁没有远大的志向？谁不愿意多受些专门知识的训练和高等教育的陶冶？谁不愿造成高人一等的资格作投身社会的“敲门砖”？可是当我们考查现实社会的真实情况的时候，马上会感到失望，会感到理想和实际的分离。在大学里受过专门知识的训练和高等教育的陶冶的人，当他们一跨出学校的大门，插足到社会上去，他们就会觉得在学校里学习的东西很多不能在现实社会里应用。所学习的知识愈高深，与社会的实际情形距离得愈远，结果学问成了自己的私有物，与

社会基础及大众生活完全脱离关系。学习理工科的学生，由于国内工商业多被控制而不能独立发展，结果弄成“英雄无用武之地”。学习文法科的学生，更因为国家政治没有完全走上轨道，各部门的公务人员，其任命的关系仍然脱离不了封建的意味。结果一方面是“怀才不遇”，一方面却依然是“人不称职”而发生“才难之叹”。在这“人浮于事”的社会里，真正凭着大学毕业生的资格而在通盘计划之下担任起适当的工作的恐怕也是“凤毛麟角”。简单地说：一方面因为在学校所学的功课与现社会隔离而不能应用；一方面因为学校毕业后所获得的资格，往往不能换到一个恰当的工作。因此，“毕业就是失业”成为大学毕业生一种普遍的叹息。经济宽裕或机会凑巧的人，在大学毕业后更进一步到外国去镀镀金，有的在图书馆中埋头苦读，有的在跳舞场上或咖啡馆里消磨了几年的时光，结果，一顶博士或学士的头衔，新添在脑袋上，跑回这破落的祖国，学识更专门了，资格更高贵了，职业方面高不成低也不就，于是乎照常与社会隔离着，或者不得已跑到大学校里担任一席教授或讲师，把自己这一套“碰钉子”的衣钵，重新传达给他们下一代的青年人。就这样，社会的矛盾，把青年人“远大的志向”吞噬了。

因为想到这些情形，所以我并不因为这封沉痛的信而替我这位朋友感到忧戚；反之，我对于他的不得已放弃学籍而顾全身体，却表示十分的欣庆。因为我觉得健全的身体是青年人不可缺少的条件，能够把自己生理上的缺憾弥补起来，对于他的求知或从事社会事业都是有极大帮助的。如果有人

忽略了自己的身体去勉强维持空洞的学籍，去勉强博得虚伪的资格，结果学籍和资格都使你感到失望时，自己的身体，也就不可救药了。这样是自己作了学籍和资格的奴隶，而不失其为一个大傻瓜！

从知识的本身上说，它不只是课堂传授的材料，也不只是书籍记载的内容。它还包含着更重要的活知识，更宝贵的实际生活的经验。从事业本身上说，它不是呆板的具文或法定的工作。它还包含着现社会全面或局部的种种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因此，我要特别提出两个疑问，一以供我们充分的商讨，一以解释这位朋友满胸的疑难。我的疑问是：（一）求学一定要有“学籍”吗？（二）从事社会事业一定要有“资格”吗？

谈到第一个问题，我首先要提出：求学的方法是以“自学”为主。譬如在学校里，教师所讲述的，不过是些粗枝大叶，即或他的意见有独到之处，也不过是他个人从一定的观点所得的主观的见解。而且教师的责任，本来就只处于辅导的地位，他并不能全权代表我们做学问。他只能指点门径，介绍书籍，传递经验。因此我们可以见到自学的能力是我们求知的基础。再说知识的领域，我们如果关上学校大门在里边摸索，那么我们只能狭义地了解到它包括一些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许多学习工具的课目等。其实我们再仔细一考察，这些知识部门，本都是“发于一源”，而且有时是不能严格地划出一定的界限的。而这些知识的内容，由于研究者的观点不同，而产生出不同的解释，我们怎样去接受和选